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理论论丛. 第三辑/张一兵,周晓虹,周宪主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9

ISBN 7-305-04215-3

I. 社... II. ①张... ②周... ③周... III. 社会学  
—文集 IV.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9886 号

书 名 社会理论论丛[第三辑]  
主 编 张一兵 周晓虹 周 宪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发行电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328362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信箱 [nupress1@public1.ptt.js.cn](mailto:nupress1@public1.ptt.js.cn)  
[sales@press.nju.edu.cn](mailto: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1.5 字数 3214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  
ISBN 7-305-04215-3  
定 价 25.00 元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目 录

## 专题研讨:大卫·哈维与现代性空间研究

从地理学到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

——文献史和问题史中的哈维 …………… 胡大平( 1 )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希望的空间

——晚期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哈维 …… 胡大平( 54 )

地理学想象与社会理论

——社会理论视域中的哈维 …………… 胡大平( 99 )

全球空间中的身体和政治人…………… 大卫·哈维(145)

## 学术论文

社会事实再现的文学路径:一种人文研究方法的探索

…………… 翟学伟(185)

互惠与秩序

——人类学有关礼物交换与夸富宴的研究

…………… 赵旭东(209)

政治的正当性和政治家的伦理

——韦伯与现代政治…………… 王小章(238)

消费、符号与空间 ..... 郑 震(263)

## 海外来稿

语言与象征性权力

——布尔迪厄的语言、实践与政治理论述评

..... 约翰·B. 汤普森(282)

当代社会学方法上的矛盾..... 谢 宇(325)

## 学术评论

农学新视野：农业哲学 ..... 祖田修(332)

评《断裂》..... 张德胜(353)

稿约..... (357)

# 从地理学到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

## ——文献史和问题史中的哈维

胡大平\*\*

### 一、引 论

大卫·哈维(Harvey, D. 1935~ ), 1960年以《关于1800—1900年肯特郡的农业和乡村变迁》一文获博士学位, 次年从布里斯托尔开始教学生涯, 其后一直作为一名职业地理学家在大学任教(20世纪70年代后长期就职于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大学)。然而, 他在当代人文研究中的影响已不是地理学所能够概括, 在全球化、社会理论、文化研究、激进政治学、后现代主义等多个领域中, 他已经成为被广泛引述的理论家之一。

哈维的研究和著述, 充分体现了哈贝马斯所称的那种“解放旨趣”, 以地理学想象为依托, 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构型中包含的剥削和压迫, 展望可能世界的乌托邦。在实现这一理论抱负的过程中, 哈维一方面把自身的理论逻辑严格地限制于马克思的传统之中,<sup>①</sup> 另一方面则试图以空间视角来整合由各种新社会运动提出的新型实践旨趣(如生态、差异等等), 提出一种洋洋洒洒的“生

---

\* 本专辑的全部论文和译文均得到南京大学文科研究项目“大卫·哈维与资本主义批判”的资助。

\*\* 胡大平博士,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下同。

态社会主义政治学”。<sup>②</sup>在今天的激进政治学中,哈维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虽然他的相关结论(如“时空压缩”、“弹性积累”等)被广泛引作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源,但实际上他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的理论思路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这便产生了这样一个显著的矛盾,他的理论是通过他本人批评的“后现代主义”以及他并不以为然的“文化研究”得到广泛扩散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文化转向的加速及其在中国学术界的扩散,哈维可能仍然不为多数中国人文研究学者所知,而只局限于被称为“地理学”的那个学科中。

哈维在论及马克思主义传统时曾经指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偏好过去主要集中于历史性(时间),而在空间研究中显著局促。如果能够将这个观点泛化的话,我们可以说,在更为广泛的人文社会研究传统中亦是如此。因此,更进一步,我们是否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呢?无论是所谓“全球化”在当代直接表征为一种空间的布展从而给我们提出某些空间问题,还是哈维著述被人们接受见证他的判断中包含着真知灼见,都说明在我国当前的人文社会研究中应该扩大对这一类理论和思想资源的重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学科或者知识的完整性进行的“补白”工作,事实上,它内在于我们理解整个现代性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变迁的需要。<sup>③</sup>在这一背景下,对哈维的关注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作为西方人文地理实证主义传统的叛逆者,他以自己的学术路径提出了实证研究与批判立场之间的沟通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守护者和革新者,他以某种范例指示了今天马克思主义研究拓展的空间和路径等等,这些问题并不局限于某个学科和论域的内部,而广泛地与今天的知识进步、知识分子定位等突出问题联系在一起。

作为《社会理论论丛》大卫·哈维与现代性空间研究专题研讨的一篇介绍性文章,本文并不详细评论哈维的学术和思想贡献,而是以其文献为线索总体上描述他所提出的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

的重要论见,更进一步,在更大的社会和思想变迁中,基于这些问题的定位,阐明哈维的学术路径和理论逻辑。

## 二、哈维著述概况

综观哈维的著述经历,他占据了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交集,在旨在改进当代人类状况的社会理论运动中,以顽强的乌托邦姿态丰富了地理学想象力。

在相关研究中,哈维被引用的最早文献是载于1967年出版的《地理学中的模式》一书的《地理学中的空间样态进化模式》<sup>④</sup>一文。虽然哈维在该文中指出全部的地理学必然都是历史地理学,并因此强调通过研究社会形式的生成和分析时空变迁来理解当代地理,从而实际指出他本人在其后长期持有的技术路径,但它仍然是严格意义上地理学科的专业论文。因此,虽然我们也将之作为述评的起点,但并不抬高这个起点。

事实上,哈维在2001年出版的《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sup>⑤</sup>可以作为述评路径的直接参照。这是因为,这一著作精选了其1974至2000年公开发表的部分论文(含访谈)。在编排的时候,哈维将它们分成两个部分:“地理学知识/政治力量”和“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这两个部分恰当地概括了哈维学术旨趣的两翼: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地理学想象和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而这两翼是由马克思主义所维系的,1974年以后,在其全部著述中,马克思主义既是主要的方法论资源,又为上述两翼注入了基本的价值目标。<sup>⑥</sup>

使哈维声名鹊起的,首先不是其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著述,而是1969年的《地理学中的解释》。这本有关地理学科学方法论的著作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理学实证主义化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甚至被一些评论者视为新地理学的“圣经”。<sup>⑦</sup>也就是说,在其学术生涯中,哈维首先是以英美人文地理学革新的一个重要代

表人物出现的。然而,1973年,他公开发表《社会正义和城市》,逆转其早期的实证主义倾向而一跃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杰出代表。在其后的研究中,他一方面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入手,分析当代空间构型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致力于使地理学成为“人性化的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另一方面,通过对巴尔的摩等城市的经验研究,不断发展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研究的视角,把空间研究与日常生活分析结合起来,从而为拒斥后现代主义,高举马克思主义研究纲领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理论资源。在30多年研究中,哈维以其独特的“历史—地理的唯物主义”视角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而且为“现代性”、“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多个论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并成为占据这些论域的一个重要左派旗手。

因此,在介绍、评论以及借鉴他的理论过程中,首先需要阐明他的这种变化。在哈维的评论者中,人们往往喜欢用“重要的逆转”来定位这一变化。<sup>⑧</sup>虽然我们从哈维的全部著述中都会看到早年实证主义训练养成的分析风格,但这种“逆转”或“颠覆”的意义却绝不能低估。因为,它不仅使空间研究溢出严格的地理学科并使之从属于更为宏大的社会理论,更重要的是彻底否定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性质。把实证主义方法论在地理学科中推上顶峰,然后反戈一击,由此造成的震惊感确实不能以学科内部的挑衅性姿态来概括。它远远超出了学科,而与西方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宏大的理论变迁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地理学最初亦是通过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来实现自身科学化并为人类地理(空间)设计提供确定性依据,《地理学中的解释》无疑代表了这种取向。但是,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理论代表指出的那样:试图排除价值的中立科学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它顽强地抵抗这种不可能性而实际上倾向于把自身孤立于科学意义之外。事实上,20世纪

60年代,地理学内部不仅已经出现了对“与社会相关的”(social relevant)主题的研究,而且到70年代,相关性(relevance)甚至被用作衡量地理学家对分析和解决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贡献程度。这一变迁的实质与霍克海默所主张的从传统理论向批判理论的过渡具有深刻的共性,即从纯粹的逻辑形式走入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实践中。1969年,一份叫做《对立面:激进地理学杂志》(*Antipode: A Radical Journal of Geography*)在美国克拉克大学诞生,这标志着人文地理学之激进传统的形成。在这一地理学转向过程中,哈维起着重要的作用。其《社会正义与城市》,非常明确地把“社会正义”引入并作为地理学研究的重心,而这一倾向可以看做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中结论的践履。在那一文献中霍克海默说:“思想家的活动的本质促使它去改变历史并在人们之间建立正义”。<sup>⑨</sup>更为重要的是,哈维在这一转向中,持续地为其注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因此推动并代表着激进地理学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进一步转向。

当然,实现上述贡献需要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并意味着在实证主义方法论方面训练有素的哈维必须脱胎换骨。这一过程是通过艰辛的马克思文本阅读来实现的。除了70年代初游学巴黎深受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外,最重要便是从1971年以来持之以恒地对《资本论》的阅读。这种阅读不仅为他游刃有余地以马克思主义姿态介入各个论域提供坚实的基础,而且同时为他发现和填补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空间研究的“空白”奠定了基础。1982年,他出版《资本的界限》,再次实现一个“惊人的跳跃”<sup>⑩</sup>——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这一成果构成了其后研究的全部出发点和对资本主义空间构型生产分析的理论基础。

1985年,哈维同时出版《资本的城市化》和《意识与城市经验》两本书,它们是有关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姊妹篇。它们共同的副标题是: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和理论研究。1989年又删节修订成一本《城市经验》。这两部著作所涉及主题,正是哈维在准备《资本

的界限》的过程中所关心的,阅读《资本论》的结果帮助他解决了叙述的逻辑。然而,哈维并非简单地按照自己学术研究的自发路径向前走。他的这个姊妹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采取了与其他理论对话的姿态,既突出城市问题在当代的重要性,又捍卫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领域的理论地位。一方面,1981年,两本与空间有关但都包含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论著出版,一本是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另一本是桑德斯的《社会理论和城市问题》。这两本书无疑都主张空间的重要性,但是它们却有意无意地贬低城市或城市化问题在当前的的重要性。前者强调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城市不再是占统治地位的时空容器或者权力容器,民族国家替代它占据了位置,后者拒斥“城市化在理论上是一个特殊的分析对象”。更重要的是,它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能胜任空间分析。这种姿态可能影响了另一个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曼纽尔·卡斯特,后者在1983年出版《城市与草根(大众运动)》时,便公开告别马克思主义了。另一方面,《资本的界限》出版。虽然这本书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是令哈维不满的是,大多数评论者都忽视其核心贡献是将空间生产和空间构型作为一个积极的要素整合进马克思理论框架的核心。<sup>⑩</sup>所以,哈维在这两部著作中试图通过城市化的历史经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力的。在他看来,城市不是一个物而是一个过程,它并不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城市化研究关注资本积累过程;劳动力、商品以及货币资本的变化流动;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的变革;以领土为基础的阶级联盟之间信息和地理的冲突等等。正是从这些角度看,地理作为一种景观,是具有某种特殊空间构型的人工环境的“第二自然”,这种“第二自然”是在资本的控制下生产出来的,因此直接体现了政治权力。这构成了哈维此后研究的基本立场。

1989年出版的《后现代性的状况》是一本很难以地理学视角来概括的著作,虽然空间的维度(空间的生产及其体验)仍然构成其中心线索。事实上,这本书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深的历

史底蕴把地理学想象植入到社会理论之中,从而为现代性研究提供一种方案。当然,更重要的是,哈维的全部讨论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操作的,他也为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性这个论域中有所作为展示了一种可能性(当然,与其《资本的界限》一样,这个方面仍然被大多数评论者忽视了)。这本书的中心主题是,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体验,其核心在于时空体验,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发展之动力与文化生产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的复杂过程之间重要的中介环节。这一论见是针对后现代主义及其研究的流行腔调而做出的。这种流行腔调在反对元理论、反对宏大叙事、反对本质主义甚至反对实在的口号下主张差异、流动甚至纯粹的个人感觉。对此詹明信曾经做出反应,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化是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并激起巨大的反响。<sup>⑩</sup>不过,詹明信的研究仍然是概括性的。他虽然敏锐而准确地做出了判断,但其政治敏感性和学术的穿透力并没有详细的历史作为支撑,更具体地说,后现代主义文化形成的具体机制和过程在他的研究中并没有展示出来。而哈维的《后现代性的状况》焦点便落在这里。

如果说《后现代性的状况》以一种宏大的视角重申了《城市经验》的基本论调,那么,由于它的实际影响,哈维将需要进一步夯实其元理论——在理论和实践、空间体验和空间生产之间的协调,并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到当代政治话语的论争中。这一点,也正是他所反复强调的“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之马克思主义旨趣。1996年,他出版《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这标志着一种以地理学想象为基础的社会理论的诞生。在这一文献中,他基于话语理论重新定位了理论的功能,设定了以“过程”为中心的地理学想象的基本结构,在此基础上回答了时空之社会构造的肌理,并探讨了以正义和差异为中心的政治学的可能性和方向。这一文献在直接的意义上为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介入全球化论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四年之后,哈维出版《希望的空间》时,他所要求的则是在“回归马克思”的基础上来探寻对资本主义进行替代的可能性了。

在其全部的理论经历中,亦完成了从《社会正义和城市》以来的地理学—社会理论—政治理论的建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研究的结束。相反,随着他的影响的扩散,在国际学术空间中,他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三、从科学到价值的“重大逆转”： 《地理学中的解释》和《社会正义与城市》

《地理学中的解释》是哈维作为一个地理学家的成名作。这本书是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实证化背景下对统一地理学科学方法论的一本专著,在其中,他基于实证主义(尤其是亨普尔和波普尔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在宏观上讨论了地理学理论,从而解决了地理学内部的科学方法争论。无疑,这本书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但哈维不仅没有停留在这种荣誉中,相反,四年之后,他出其不意地告别了这种逻辑,转向批判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并逐步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从而给学术界留下一个迷人的“重大逆转”。虽然哈维可能终生都没有消除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中形成的实证主义风格其影响<sup>③</sup>,但无论如何,这本书所辩护的严格的“地理学学科”及其为之辩护的实证主义哲学基础,都是哈维后来要打破的,所以,它的具体内容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在哈维文献梳理的起点上,我们将之纳入到他的理论逆转过程中,分析其形成的背景及其隐含的矛盾,从而为理解他的转向甚至更大范围内人文地理学从实证主义向批判立场的转向提供一点帮助。

哈维的学术始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计算革命”氛围。这种革命既是自然科学革命、科学哲学发展的后果,也是经历结构功能主义转变之后的西方社会和历史研究的某种必然趋势。它的典型特征是把模型和方法置于整个研究的中心位置,从而解决社会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sup>④</sup>。虽然《地理学中的解释》确实带有一定的矛盾性质,但在代表了人文地理学的实证主义转向成就

这一点上是确凿无误的。正是这一原因,这本书在整个人文地理学的历史演化中留下一个奇特的位置。这个位置的奇特性在于,当人们接受《地理学中的解释》,将之视为人文地理学在实证主义(特别是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影响下重新构建学科意向和方法论的一个有抱负的尝试,哈维本人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中宣告这种尝试是创伤性的。因为它无力实现社会内部的重大的变革。因此,他在前一本书中旨在推动解决的“在地理学中发展起来的方法论争论与关于一般知识的方法论争论之间是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sup>⑮</sup>,也即地理学本身的科学性,直接变成了一个不可能的问题。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讲,这是包含预设结论的意识形态提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情况呢?哈维又试图如何来推动地理学本身的深入呢?

一般认为,哈维是“马克思主义在地理学中发展的主要始作俑者之一”<sup>⑯</sup>,《社会正义与城市》这本书正是这一努力的最初成果。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既是其转向的动力,亦是转向的结果。本文第二部分已经在总体上描述了哈维这一转向的理论氛围,这种氛围表明,哈维的转向并非一个奇特到不可理解的事件。相反,它的背后仍然是20世纪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维方式的变迁,以及在这种变迁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证主义的争论。

在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哈维自己的研究中,这种转向也不是如其表面那样不可理解。首先,从理论上讲,《地理学中的解释》的理论目标虽然是形式化的科学,但是哈维在公开发表这一著作时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为临时的报告”,他自己在序言中明确地指出,1968年6月结束这个手稿以来,他已经改变了几处观点,并能识别在分析中的错误和不足<sup>⑰</sup>。这个提示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们发现,实证主义确实构成了这本书的基调,另一方面,他也在其中保留了一些看法,例如他非常明确地强调:“决策是不可能道义的或伦理的真空之内做出的”。<sup>⑱</sup>虽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扩大这个裂隙,但毕竟这也是个裂隙。如果考虑到卢卡奇

以降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科学观之“价值中立”的批判,我们便能理解,当哈维指出强调“没有理论,我们就不能指望对事件做出有控制的、始终如一的和合理的解释”,<sup>①</sup>除非他认为理论本身已经包含了价值,否则这一断言便包含着内在的矛盾。事实上,他按照科学哲学的路径把科学问题引向“真”之形式,从而通过加强模型(即理论的形式表述)的作用来保障客观性和真实性,这样就把韦伯—温奇问题<sup>②</sup>悬置起来,使理论本身纯粹形式化。按照他后来的解释,这种选择恰恰是他的“特定时刻的观点”——对严格的地理学的沉浸的结果。当然,“1968年6月”恰恰中断了他的这种沉浸,因为,他自己解释道,他创作《地理学中的解释》时,“在我看来,在用理性的科学方法解决地理学问题和有效地运用计划的方法解决政治问题之间,实际上不存在冲突。我如此专注于撰写这部著作,以至于忽视了周围世界是如何坍塌的。1968年5月我将著作提交给出版商时,政治温度的剧烈变化使我感到了深切的不安”<sup>③</sup>。由于这一点,哈维到美国以后便开始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到美国后,拉铁摩尔的故事促进他以新的方式来思考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推动他研究大学以及城市的政治历史,并最终促使他转向马克思主义。

拉铁摩尔并非激进主义地理学家,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sup>④</sup>他的奇特性在于独特的中国经历、相关中国研究以及对华外交政策主张而遭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9年,哈维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听到了拉铁摩尔的故事,并十分感兴趣。哈维不仅访问了他,而且甚至试图要求曾经粗暴地对待他的威特夫做出解释。<sup>⑤</sup>后来,1983年,哈维曾写过一篇名为《欧文·拉铁摩尔:回忆》的回忆文章,在其中,他强调,“拉铁摩尔或许已经赢得了他的私人战斗,但是他失去了影响美国公共意见并因此影响美国对华和远东政策的战争。直到越南战争的痛苦教训,以及尼克松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打出‘中国牌’,那一战场上的战斗才恢复。但是,拉铁摩尔的例子同样表明,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培养那些远离

狭隘国家利益概念或者冒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的视角是如何危险的。”<sup>④</sup>正是对这一类问题的考虑,哈维不仅没有退缩,反而不断加强其学术研究的政治诉求,以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的研究重新定位地理学的科学方向,并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中坚力量。1973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只是这个方向的起点。

在《社会正义和城市》的“导论”中,哈维开篇便讲这本书是对先前那本讨论方法论的著作所“故意忽视”的某些哲学问题的探索,这便是社会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观念对地理学研究的影响问题。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对于空间的本质、理论的本质、甚至知识的本质和科学研究的本质都有重要的影响,它们不应该被排除在空间研究之外。事实上,哈维所言社会哲学和道德哲学问题也即是长期困扰人们的理论与实践(或语言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结构与过程、生产和分配、效率与平等(公正、正义)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在各个不同学科的内部存在着重大争论,从而产生不同学科内部对立的流派,如经济学关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分,而且在根本上纠缠着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在哲学层次上,它们都汇总到主/客体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上。由于它们的重要性,在全部西方思想史中,围绕它们的争论从来也就没有平息过(只不过不同时代的表现方式有很大的差异)。20世纪早期批判理论与实证主义之间的争论,亦留下十分丰富的文献。只是,由于地理学学科实证主义转向较为迟缓,这个问题在地理学中相对来说是沉默的。前面已经说过,《地理学中的解释》已经涉及上述问题,只是由于这本书的主旨是从方法论角度为哈特向(Hartshorne)所提出的“地理学性质”问题提供一种说明,因此哈维不能照顾观念和道德(即价值问题)在规划和区域科学中的影响。现在则不同了,在美国通过拉铁摩尔这样的人物例子和巴尔的摩这样的城市例子,哈维必须直接面对这些问题。

哈维似乎一股脑地把几个“本质”问题全都拿出来了,但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却遵从了自己的学科语境,并保留了《地理学中的解

释》一书充分展示出来的科学方法论偏好。因此,他实际入手的问题是,是否应该以及怎样在把空间和地理学原则应用到城市和区域规划中时贯彻社会正义的原则。这个问题既延续了他早期论著的主题,又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因为“社会正义”正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引起美国人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只要注意到罗尔斯 1971 年发表的《正义论》所产生的反响,我们便可理解这一点。<sup>⑤</sup>而从这一点,我们亦可断定,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便是有关空间和城市生活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价值问题。

但是,把价值引入科学,存在着诸多难题,最基本的包括:怎样弥合事实与价值的分裂?怎样建立一个评价各种价值的标准?等等。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和过程(辩证法)思想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

在哈维看来,传统地理学不仅在研究各种具体时采取孤立的视角,如他在第 1、2 章演示的那样,在城市规划和实际收入再分配问题上的各自为政,而且在根本上把空间视为脱离人的社会活动的“物自体”(即绝对空间)。最重要的是,它没有意识到地理学理论和空间形式(的生产)之间的关联(即理论和实践的脱节)。他强调,理论的本质、空间本质、社会正义的本质和城市生活的本质等四个基础性的论题在地理学中围绕社会进程和空间形式这个中心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和不变的中心复杂地纠合在一起,它们必须在人类实践问题上得到统一。因此,在“什么是空间”对个关涉地理学是否能够成为科学的对象问题上,哈维坚决主张,空间绝非绝对的、同其自身相关的东西(即物自体),而是同时依赖于环境的事实(即社会关系),这意味着必须从“社会—过程—空间—形式”这个中心主题来研究地理问题。传统地理学的失误,与事实与价值二分这个近代哲学(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一贯主题相关,而马克思通过实践对这个问题的克服对地理学来说同样是重要的。他强调,“对马克思来说,观察行为就是评价行为并且把它们分开

将会武断地割裂出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人类实践的分裂。”<sup>⑥</sup>由此,他试图把价值纳入事实(过程)。与早期卢卡奇一样,当哈维以过程视角来消解地理现象之永恒性外观——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即是物化和拜物教,并不是为所有的价值辩护,而是为以“社会正义”为中心的人道价值打开登上历史舞台的通道。也因此,他需要进一步面对“社会正义”原则为什么是可能的以及怎样实施这样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构成其后来研究的中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这个起点上,他从一般理论的角度强调,就价值本身来说,它不是人类历史中那些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在历史过程中由社会总体所影响的偶然性的东西。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把观念理解成特定历史语境产物,这是一种从哲学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向。而他本人恰恰通过这一点,从社会正义的(价值诉求)进入马克思主义。在上述基础上,哈维把对空间形式和城市生活的重新定位作为本书主线,通过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对立思想的对比,来概括革命的地理学的认识论框,并预示一种“社会—地理学理论”。

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哈维的讨论方式十分有趣。他把全书分成“自由主义的表述”、“社会主义的表述”和“综合”三个组成部分,恰好构成一个典型的黑格尔式“正、反、合”三段论结构。第1、2章分别讨论两个表面上独立的都市问题(城市规划和实际收入的再分配),第3章给出一种综合方案。这三章是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来写的。第4—6章则站到相反的社会主义立场上,其中第4章通过重新评估问题和解决方案区分了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理论,并提出革命理论的任务。第5、6章给出一个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框架。这三章构成第二部分“社会主义的表述”。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反思”,从本体论和方法论角度阐明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对城市生活的本质进行了探讨。

这一结构,既是偶然的的结果,也是其刻意的安排。说它是偶然的,那是因为,前四章是以前公开发表的论文,它们形成于哈维在

美国的最初岁月,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自己那些论文驻足于自由主义立场<sup>⑦</sup>。第5、6两章是新写的,而此时,他已经发现自由主义不管用。说它是刻意的,那是因为,在“导论”中,他清晰地强调,这种结构将使读者判断哪一种表述更具有解释力<sup>⑧</sup>。事实上,这种结构充分显示了他对困扰西方思想史的二元论的分析及其综合,演示了以空间研究为入口从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径。

哈维在这本书中提供的马克思主义框架确实是初步的。在这一过程中,哈维看重的是马克思科学方法的启示意义。在这一文本中,早期实证主义分析传统的方法论训练仍然给了他很大帮助,<sup>⑨</sup>在直接的意义上,他只是在元理论层面将马克思的总体性(主客体辩证法)引入地理学研究。在其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他才逐步从这种元理论发展出一套适用于地理分析的框架。而在此时,虽然他已经把作为社会形式的城市生活、作为人工形式的城市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作为焦点问题,但在分析后一问题时并没有独立见解,只是使用了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观点。到1982年《资本的界限》出版后,他才从空间角度消化了《资本论》的逻辑,并开始提出一些马克思不曾遇到的问题,从而形成较为精致的解释当代城市化和空间问题的框架。

#### 四、新起点:资本的界限或《资本论》的界限

1982年,哈维公开出版《资本的界限》一书,在直接的意义上,它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著作,或更严格讲,是一本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学著作。哈维自己回忆,这本书的初始意图是澄清马克思的相关理论,结果则是形成了其后全部研究的基础。因此,在他的全部著述中,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也他自己最喜爱的著作。但是,也正如哈维所言,这也是最少受人关注的著作。我们已经看到,在今天的相關论域中,他的《后现代性的状况》成了必读书,几乎被所有相关的重要研究引用,但《资本